



城市文化与方方作品风格形成

贺汪波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 文化创意与艺术设计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4)

摘要: 作家的精神气质、城市的历史与形态、城市文学的文本、作品中人物的性格个性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武汉城市文化的特点和作家方方创作风格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楚风汉韵造就了方方个性张扬、无拘无束的艺术思维,码头文化让她在创作倾向上兼收并蓄、开放包容,市民文化让她形成大俗通雅、平易自然的审美取向,首义文化赋予她敢为人先、改革创新的艺术追求,精英文化则让方方在创作中坚守着城市知识分子的立场。

关键词: 楚风汉韵;码头文化;市民文化;首义文化;精英文化;作品风格

中图分类号: F507.4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31X (2012) 05-0011-06

文学赋予一座城市的意义,基础在于这座城市的文化身份。不同的城市有着不同的文化身份。传统文化是城市文化的根基。从历时的角度看,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文化对其传统文化也进行了现代化地调整,增加了新的色彩;从共时的角度看,城市文化并非只是单调的某一种文化特质,而呈现出“五彩缤纷”的图景。例如,北京的文化身份很容易被人确认为政治历史文化名城,上海则是现代化的工商业城市,那么,武汉有一种怎样的文化身份呢? 码头文化、殖民文化、市民文化、内陆文化,还是精英文化、山水文化、荆楚文化?

城与人、城与文之间息息相关。人建立和塑造了城市,既建立了自己赖以生存和生活的空间,也在建立自己的精神文化家园,将市民群体的文化品格、精神气质、审美倾向、思维模式等都投射到城市这样一个物质文化形态上。同时,千百年来,城市的历史积淀、地理位置、自然条件、气候特点、传统风俗也影响、孕育着居住于其中的人,使人和城发生了某种程度的文化同构。可以说,城市的性格实质上就是其居住者的整体性格特征。某一城市文学,常常由这一城

市人书写,他们对长期生活着的城市有着深厚独特的体验和思考。当作家通过文学的方式来书写城市、解读城市的时候,必然会在客观描摹城市的同时,更多地融入自己对这座城市的个性化的解读与感受,使作品中的城市既是客观存在的城市,也是作家主观想象中的城市,成为主客观合一的人文空间。可见,作家的精神气质、城市的历史与形态、城市文学的文本、作品中人物的性格个性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绝非只有“反映”、“再现”的单纯对应关系,而是一种超出经验与“写实”的复杂互动关联。那么,作家方方笔下的武汉及武汉人具有怎样的气质风貌呢? 而方方本人的艺术思维、艺术追求、创作倾向上与武汉文化又有着怎样的地缘关系呢?

一、楚风汉韵——个性张扬、无拘无束

武汉地处楚地,荆楚文化是其文化的底色,是武汉文化传统的根基。三千五百年前的中国殷商时代,在今天的武汉市黄陂区,一座盘龙城悄然崛起,就此叩开了武汉的文明历程。盘龙城是中华文明古国长江流域第一座古城,也是中国唯一一座基本未受到

收稿日期:2012-08-15

作者简介:贺汪波(1975-),女,湖北大冶人,硕士,武汉城市职业学院文化创意与艺术设计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破坏的商代早期城市遗址。它展现了武汉地区灿烂的青铜文化、较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商业以及完备的城邑形态和功能,被称为武汉的“城市之根”。西周时期,楚文化诞生;春秋以后,神秘华美、浪漫空灵的楚文化成为了武汉地区文化的主流,高山流水的千古绝响,屈赋骚辞的荆楚神韵、凤凰沐火的神奇、九头鸟的诡秘、黄鹤归去的缥缈,共同构成武汉城市文化的浩荡之源。

楚文化人文精神具有四大基本要素:“楚人的独立自主意识、奋发向上的精神、浪漫的情怀、鬼神崇拜之传统。”楚文化个性张扬,无拘无束,想象丰富,恣意驰骋,绚丽粗犷,神奇浪漫,气势恢宏。它是感性、浪漫、狂放、神秘、奇丽、孤愤的。

楚人崇尚太阳。但南方太阳神文化与东方太阳神文化不同的是,“它是次生形态的水原性的而又带着些内陆色彩的‘太阳神文化’。它热烈、活跃、浪漫、灵动,显然跟带着严酷、冷峻、朴实色彩的北国‘山神文化’、‘草原文化’不大一样,后者显然是大陆性的、高原性的。”

楚人崇尚凤鸟。凤凰是我国南方的图腾。楚人的祖先祝融是火神兼雷神,也是凤的化身。楚文化遗存中大量存在人首蛇身和人首鸟身的图案表明了楚人对鸟的崇拜。凤凰形象也经常出现在楚国文物、楚人衣服刺绣等各个领域。凤凰成了吉祥幸福、高贵尊严、空灵浪漫的象征。九头鸟的出现,最早源于楚人的九凤神鸟,《山海经》中最早介绍了九头鸟形象:“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北极天柜,海水北注焉。有神九首,人面鸟身,名曰九凤。”后演变成九头鸟,在刘基《郁离子》中沦为怪鸟。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在一次讲学中为九头鸟平反,他认为,九头鸟是褒义,凤有九个头,砍到第九个的时候,第一个又长起来,九死一生,是生命顽强的象征,是感情奔放的表现。黄鹤楼的传说及文人墨客的诗词歌赋中都赋予了黄鹤神鸟的意蕴,这只想象中的神鸟成就了一座千古名楼。凤凰、黄鹤、九头鸟和武汉这座城市的渊源充分表明楚人崇拜鸟、歌颂鸟,他们作为“鸟的传人”,其文化与黄河流域“龙的传人”有明显差别。

楚国文化情感浓烈、想象丰富,个性自由奔放、艺术手法瑰丽多变,以老庄哲学为思想内核,以庄骚文学、青铜冶铸工艺和艺术乐舞等为具体文艺形态。尽管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楚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异、整合,但其中个性张扬、无拘无束的特性经过历史的涤荡一代又一代延续下来。

“地气不同,则民风有异;民风有异,则文风也迥异。”作为一位在武汉生活了半个世纪的作家而言,方方也受着武汉文化的浸染。武汉的历史沿革,风云岁月,山川地理,阡陌街巷、高山流水、白云黄鹤、风土民情、方言俚语、汉腔楚调、民间小曲,“想都不用去想,它们就会流淌在我笔下。”她既熟悉武汉,更热

爱这座城市,楚文化那种向往理想、追求梦想、崇尚自由、感性浪漫会投射在她小说中某些人物身上。如《春天来到昙华林》,谭华霖是清江土家族的一个未受现代浸染的健壮青年,是一个原始朴素的生命个体;昙华林是武汉市的一个老住宅区,现代都市的古老见证人。昙华林在都市中渐渐消逝,谭华霖在山水中健康生存,当昙华林(吴华林)遭遇谭华霖时,生命的本真意义随之被激活,人生的价值进而改变,人已经离开“自己”太久太久。可以说,华林与华霖不仅是现代城市文明与传统文化的代表,也是一个完整现代人的两个方面。山水、自然、淳朴能给原始生命巨大的张力,“光芒万丈”;而现代都市让人成长是不健全的,“瘦小无力”。而当华林遇到谭华霖时,找到了自己心灵的家园。然而,回归之路竟成了不归路。现代文明背景下的生命个体欲呼唤寻回本真时,竟会凋零。这既是方方对现代化进程中城市人的精神展开的思考,也是对传统原始与现代文明的碰撞的反思,更是对传统文化心理上的认同与继承。

方方不仅借助作品人物表达出对传统文化的眷恋,而且还通过作品的表达方式、叙述视角、内容挖掘、题材选择的多样性、丰富性表现出了无拘无束、个性张扬、浪漫不羁的艺术思维。《风景》中,她突破了常态的讲述模式,借一个已夭折的“小八子”的口将“河南棚子”的生存图景娓娓道来;《水在时间之下》用“戏中戏”的模式巧妙地以“水上灯”的传奇人生,铺演武汉的城市历史;《落日》中丁老太意识的流动与家人对她喝药后的行动两条线并行不悖;“三白”(《白梦》《白雾》《白驹》)叙事风格的转变,等等。方方犹如荆楚文坛中的凤凰,向着她的梦想,向着更宽广的文学领域飞翔,不断创作出更多灵动的作品,寻找更深邃的文学境界。

二、码头文化——兼收并蓄、开放包容

武汉城市发展历程,无不体现因水而兴、依水而盛的自然特征。无论是东汉末年及至三国时期,出现的军事城堡汉阳和武昌,还是明成化年间因汉水改道而崛起的商业市镇汉口,均有赖于河网纵横交错、湖泊星罗棋布的自然环境。两江交汇,水运畅达,为武汉码头文化的孕育和发展提供了先决条件。

东汉末年,全国经济中心出现南移趋势,北方人口大量迁入长江中游一带,汉水流域的商业获得较快发展。两晋时期,大量的北方流民涌入地处中原的武汉地区,不仅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艺,还将多元的北方文化样式引入武汉,为武汉地区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明清以来,武汉成为商品汇聚、万商云集之地,“瓦屋竹楼千万户,本地人少异乡多”、“此地从来无土著,九分商贾一分民”,充分彰显其移民性与商业性特征。为满足不断增长的商贸需求,码头相继出现。首先是修建在沿汉水入江岸的水码头,而后顺

长江也次第修建起码头。清代乾隆元年(1736年),汉口建起了天宝巷等最早的水码头。一百余年间,相继建立了大大小小的水码头,到道光三十年(1850年),艾家嘴、关圣祠、五圣庙、老官庙、接驾嘴、大码头、四官殿和花楼被称为汉口的“八大码头”。叶调元《汉口竹枝词》描绘这一时期的汉口是“廿里长街八码头,陆多车轿水多舟”的商业闹市。汉口成为了华中、西南、西北诸省水运中心。汉口开埠后,码头有了更大的包容力。外国商人陆续来汉办工厂、开洋行,从事贸易,垄断轮船运输,陆续沿长江岸建筑近代轮运码头和仓库货栈,这样的码头被称为陆码头。陆码头的出现,进一步繁荣了商业贸易,也促进了码头文化的发展。“至解放前夕,武汉有水码头243个,陆码头220个,码头工人5万左右。”

码头,伴随着商贸需要而产生,让货物、船只、人都在这里聚集、流动、分散,由此形成了与码头相应的诸多民风习俗、地域特征、群体性格。于是,码头文化孕育而生。武汉码头文化作为一种地域文化,生成发展于特定的文化时空当中,其发展与变迁的动力,源自对众多他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吸纳与融合,并以此促进自身的创新和发展,逐渐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体系。他域文化和西洋文化,与本土文化发生碰撞,使武汉不仅成为中外物质文明交流中心,而且成为精神文明和社会风俗传播阵地。回顾和反思武汉近现代发展史,如果没有码头文化,就没有武汉的繁荣。

码头文化具有流动性。“货到汉口活”,这道出了码头的特点。码头最主要的功能就是集散和交流,人与人的交流,物资与物资的交流,文化与文化的交流。这种交流具有不固定与快速两个特点。人来人往、物聚物散,“来如行云,去如流水”,“坐而能知天下事,一日看尽五洲花”都说出了码头流动迅速的特点。随着历史的变迁和经济的发展,如今长江边、汉水边的码头或不复存在,或失去了最初的功能,但码头文化却穿过历史的风尘流传至今,成为武汉城市文化色调中最为鲜亮的颜色。

人口、商品的流动带来了文化的流动。一方面,各地汇集到武汉来的商品本身就涵盖着各种文化信息,汉口成为了演示各种文化的大舞台;另一方面,商人流动带来的不同区域、不同特质的文化经过这里,又流动到其他的区域,汉口成为了传输各种文化的流动站。这种流动性,一方面,它使武汉文化充满生机与活力,避免了封闭保守、落后僵化的弊病,让吴绫蜀锦、西饌苏肴,吴讴楚调、秦俗赵风,汇聚一堂,异彩纷呈,充分显示了武汉码头文化“和而不同”与“不同而和”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在各种文化信息汇集、杂交中产生新的文化品种,所谓“兼容并包,有容乃大”。比如说,老武汉大都知道过去有种“汉汾酒”,口味清辣甘醇,既吸收了山西汾酒的酿造特点,也保留了本地的特色,这显然是文化杂交的结果。而

另一方面,这种流动性,也导致武汉文化的变化过于频繁,影响汉口市民的行为方式乃至文化性格,难以积淀成鲜明的个性。

码头文化成就了江湖习气:豪爽义气,一诺千金。码头工人生活和社会底层,多由农民构成,善良质朴的天性,艰苦冒险的码头生活让他们互相扶助,共经患难,重情重义,搭白算数,热心快肠,全力以赴;遇事冲动,不计后果。随着码头业的发展,大量人口涌入,造成异质人口在狭小的空间高度密集,出现“打码头”的恶俗,导致码头械斗纠纷层出不穷。为了解决这些纠纷,码头头佬之间经常会用“赌狠”的办法进行比拼,看谁厉害,码头归谁,在“赌狠”中,不论胜方还是败方都可能会搭上性命。爱赌狠,成了武汉人的特点。武汉人爱吵架,爱斗嘴皮子,遇事易冲动,不计后果;肤浅浮泛,急功近利。码头文化的流动性影响了市民的文化性格,财、货的易聚易散使武汉人缺乏厚重感,喜欢撮短水,显得急功近利,同时商品的聚散使得人员来如云、去如水,本土观念淡薄,缺乏认同感和归属感。

方方笔下的“武汉人”身上都打上了码头文化的烙印。《风景》中的父亲是个码头工人,十四岁就跟着祖父在汉口打码头。祖父在打码头中显得英勇而凶悍,在一次恶战中肋骨被打断,血流如注,“码头皇帝”的云南白药仍没能救活祖父。子承父业,父亲继续打码头,而且,一幕幕悲壮的往事总让他手舞足蹈,兴奋不已。祖父和父亲打码头的战史其实就是码头工人的一部血泪史,作品中让人们回到了大半个世纪前的武汉,品味着武汉码头文化的滋味。《中北路空无一人》中郑富仁的恪守父亲的教导,《出门寻死》中何汉晴的勤劳质朴,热心快肠,《落日》中丁如龙的势力无情,《风景》中七哥的急功近利,这些人物为方方文学画廊中添上了一抹鲜明的色彩——码头文化背景下的武汉人。

三、市民文化——大俗通雅、平易自然

十几年前,某杂志对中国众多城市进行点评:“大气的北京、奢华的上海、女性化的杭州、伤感的南京、精致的苏州、浪漫的珠海……”而武汉,被公认为是“最市民化”的城市。不管武汉市民是否愿意,“世俗化”已经成为外地人对武汉市民最深刻的印象。

近代以来的武汉,半开放半封闭的地理位置和半商品经济半农业自然经济的经济地位,使其古文化在与现代文明的整合中带有了一定的现代色彩。解放后,随着商业发达,信息流通,各种文化互相碰撞、融合,武汉一直处于由大乡镇向大都市的转化进程中。即便在改革开放以来,现代都市文明转化进程加快,但乡土文化品质依然有着强大的同化力量。

武汉是一种典型的农村包围城市的类型,武汉人大都来自黄陂、孝感、汉川、洪湖等周边的县市,在

投入到这个城市的怀抱时，必将把农民文化一并带进了城市，“武汉人生活了几代都脱不了那种俗气”。在探讨“俗”的特点形成的原因时，方方认为，“北京属文化城市，又被当做国都，文化气氛比较浓；上海是沿海城市，吸收外来成分比较多。武汉自古是个商埠，从来没做过国都，商业城市就是重利轻义，加上整个文化层次不高，久而久之就形成一种风格：俗。”她还认为武汉的文化，还有一种土腥气。上海、广州这样一些商业都市，它们也俗，但那是一种“洋俗”，跟武汉不同，武汉是一种“土俗”。

方方笔下刻画了众多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的小市民形象。他们不是英雄，不是伟人，不是名人，亦不是有钱有闲阶层。他们是生活在大学校园、街头巷尾、市井码头、平凡家庭里的小人物，他们中有大学副教授、高级工程师、普通家庭妇女、搬运工人、码头工人、下岗工人、小商小贩、艺术名家、贫民青年等等，他们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大多数，有血有肉，有哭有笑。他们为生存奔波，为名利烦恼，为情感困顿。方方不醉心于对生活中大起大落、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事件进行铺排，用离奇的情节吸引读者，而是怀着一份温暖的关怀、淡淡的忧伤和冷峻的思索客观残酷地铺叙现实的平庸、琐碎、重复、无奈，她笔下的小市民的在挣扎中沉浮，在忍耐中放弃，在无奈中苟活，他们虽然身份职业不同、性格个性迥异，但都凸现了武汉小市民文化性格中的“俗”。“俗”消解了城市生活的诗意，冲淡了亲情的温馨，甚至遮蔽了道义、良知、正义的光泽。

“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九头鸟”成了武汉人的代名词。一只鸟有九个头，充分反映了武汉文化的多元性特点和武汉人性格的多面性特征。除了“俗”以外，方方作品中的武汉市民性格特质中还有“精”、“爽”、“乐”等特点。

“精”指的是精明、精干。不少汉派作家笔下都塑造了精明、精干、能干的武汉人形象。如：武汉作家池莉笔下的“来双扬”。方方作品中也刻画了类似的人物形象。如《出门寻死》中何汉晴生活中的琐事让她又累又烦，伺候公婆，照顾家人，帮助邻里，这从另一侧面恰好说明了她的能干苦干精神。《万箭穿心》中也正是靠着李宝莉一个人的精明能干支撑着马学武的一家。

“爽”指的是武汉人个性中豪爽、泼辣的一面。从《出门寻死》、《万箭穿心》、《风景》、《落日》、《水在时间之下》等作品中何汉晴、李宝莉、丁老太、水上灯、“父亲”和“母亲”形象都刻画出武汉人的豪爽、泼辣。让人感受到这个城市市民热辣辣的民风。

“乐”指的是武汉人文化性格中乐观、风趣、幽默的一面。如《出门寻死》中当听说何汉晴有想死的念头时，婆婆说，“长江上没得盖子，铁路边没得警察，厨房里有刀，药店里有药。挡别的挡得住，挡死是挡不住的。也不晓得汉晴会选哪样。”小姑子说，“我嫂子呀，

走到江边，一看，哟呀，这好的江水，死在里面会搞脏的，跳不得；走到铁路边，一看，哟呀，压死了我是小事，这不是害了别个司机？这撞不得；回到厨房拿起刀，一看啦，砍缺了口子，明儿过年婆婆剃肉刀子不快了，这用不得；最后跑到药铺里，一看，死个人买药还要花这么多钱，鬼才买它。嫂子转遍了汉口，硬是找不出个法子让自己死。”当何汉晴见义勇为救了一个女孩，还将身上仅有的五块钱请女孩吃热干面，女孩感谢她说，“好人活千年，阿姨肯定寿比南山。”何汉晴说，“再加两个字，的草。”这些话语中透着武汉人的幽默智慧，及对生活乐观豁达的风趣姿态。

她在《阅读武汉》中这样形容武汉人：“脾气坏，说话凶狠，口气强硬，喜武好斗，蛮劲十足”，“聪明能干，坦率豪爽，慷慨大方，办事利索，讲究义气，不拘小节”，“武汉人精明，但却不像上海人那么能算计，那么利己；武汉人聪慧，但却没有广东人那样深藏不露的沉着和灵活多变的花样；武汉人仗义，同燕赵之士那种‘士为知己者死’的侠义有所不同，往往为自己又留着点余地；武汉人直爽，与没遮没拦的东北人相比，难免不带上点小弯弯；武汉人天真，见朋友什么事都连兜带底地说出来，但最要紧的事也总还能压在喉咙管里”，“既有北人之蛮，亦有南人之狡”。

在写作手法上，方方始终用一种平静、冷静、乐观的方式去描摹世情百态、人世悲欢。在写作风格上，方方大俗通雅、平易自然，用市民能接受、能理解的风格去表现武汉的市民文化、武汉人俗、精、爽、乐的特质。

四、首义文化——敢为人先、改革创新

在武汉文化纷呈的色彩中，有一种催人上进、影响深远的文化——首义文化。

辛亥首义文化无疑是中华民族在近代创造的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一种进步的近代革命文化。中国的古代文明没有挡住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坚船利炮。连绵不断的战争让中国丧失主权，领土完整遭到破坏，战败后的割地赔款，加之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让中国面临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中华民族满目苍夷。近代中国历史既是民族屈辱史，也是人民的奋斗史。进步的中国人不断在探索拯救中华的路。百日维新、戊戌变法相继失败，民族危机一步步加深，有志之士逐渐认识到中国要自强、要发展、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举起革命的大旗，以武力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就必须建立一个全新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走民主共和的道路。辛亥革命正是在中华民族的这一历史转折关头发生的。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推翻了统治中国人民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打碎了长期禁锢中国人民的封建主义精神枷锁，极大地解放了人民的思想，推动了历史的进步，具有重要的历史

意义和文化价值。“首义文化上承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又下启救亡图存的革命文化，”辛亥革命是中华文化在晚清时期的一次创造性发展。首义文化也是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结合的反映，它带有显著的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色彩，代表了近代中国文化前进的方向。

首义文化集中地体现为中华民族固有的、世代传承的爱国主义传统和自强不息、奋发有为、开拓进取、不怕牺牲、追求革命、赞美进步的精神。它既有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基，也充满着时代特色，更影响着后来的革命者和建设者。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三烈士在清军的严刑逼供下，坚贞不屈，慷慨就义。这是荆楚英才用崭新的形式延续着中华民族的爱国情怀与执着精神，用全新的魅力展示了中国文化生生不息的创新精神。为了纪念这段历史，武汉建成了起义门、辛亥革命纪念馆、首义广场，还将那段道路命名为“彭刘杨路”，如今，首义文化区迎着八方来客，成为武昌文化一道美丽的风景。武汉人还从这段历史中提炼出了武汉的城市精神——“敢为人先，追求卓越”，让首义文化在当代大放异彩。

“一百年后，当我们再度回望这段历史，回望当初的偶然和必然，回望那些为了家国命运抛头颅洒热血的人们，我想，最不应该忘记的是那些革命者们的情怀，他们为了中国的未来，为了人民的福祉，而不顾一己之生命，置生死于度外。我们这个时代太缺乏这种无私无畏的精神了。”

敢为人先、改革创新、无私无畏，是方方对这个时代精神的呼唤，也是她多年来文学创作上的执着追求。

1987年，方方的《风景》发表，引起文坛关注，被誉为“新写实”小说的开山之作。从那以后，方方的每一篇作品问世，都会引起很大反响与关注。她在不断地超越“新写实”：“方方的创作路数是宽广的……她有几副笔墨，有多方面的才华，善于处理各种题材，善于开掘不同人生状态中的丰富意蕴。”她用自己的笔践行着敢为人先、改革创新的精神。《祖父在父亲心中》、《乌泥湖年谱》、《行云流水》、《无处逃遁》等作品对祖辈、父辈及当下这三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及行为方式进行书写，表明知识分子无法摆脱所处的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水在时间之下》让一个人的传奇人生与一座城市的历史在“时间”这一共同背景下同步上演；《过程》、《埋伏》、《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万箭穿心》等写出了人与环境的悖论，人无法摆脱命运的无奈；《落日》、《出门寻死》等作品直接运用方言进行写作，突出了地域文化特质。她一直在实践，也一直在突破。

五、精英文化——城市知识分子的创作立场

武汉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有着深厚的精英文

化渊源，这里曾留下了无数文人墨客的足迹。李白、孟浩然、崔颢、白居易、苏轼、李商隐、岳飞、辛弃疾、张居正、公安三袁、黄遵宪、康有为……都在这里留下了灿若星河的美文佳句。汉阳琴台，伯牙子期高山流水遇知音；武昌设立过历朝的湖广总督府，明朝的楚王府更是传世九代，繁华了六百六十多年，使武昌充满宦宦气息和学术氛围。洋务运动时张之洞引进西学，兴建、改建了江汉书院、算学方言学堂、经心书院、两湖书院等五个书院，大胆进行教育革新。张之洞创办的自强学堂后来发展成为武汉大学，汇集了学贯中西的一代俊杰。年轻的汉口还孕育了国粹京剧，一代宗师余派和谭派在此发源。

作家方方祖籍江西彭泽县，出身于江苏南京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有很深的家学渊源。祖父、父亲学识渊博，方方从小接受古典诗词的熏陶，培养了她敏感深邃的审美感受力。青少年时代，她阅读了大量的世界名著，这些作品滋养了她理想主义的情怀和批判现实的眼光。温暖的家庭为她营造了良好的成长空间。因父亲工作的变动，方方两岁时就随父母来到武汉，一住就是半个世纪。在心理认同上，武汉就是她的故乡。虽然是外来身份，但更有故乡情结。甚至，她比土生土长的武汉人多了一些对这座城市的敏感，她能更冷静而细致地观察生活在其中的人们，这份特有的城市亲切感让她笔下的人物在其间游走。

四年装卸工人的经历让她能体恤底层市民的疾苦，良好的家学渊源与深厚的文化底蕴更让她熟悉知识分子的生活困顿，并常用启蒙者的眼光关注、审视和批判现实社会。因为出身的背景，方方目睹了父辈们艰难、尴尬的生存方式与生活结局，自然多了一份生活的沧桑感和生命的厚重感。她欣赏知识分子的庄严，也感慨他们的软弱，她尊重他们的学术，也批判他们在世俗世界里的妥协，她捍卫他们的尊严，也同情他们的无奈。在写作时，她常常自觉地站在传统的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来描摹芸芸众生，书写生存百态，冷静、深刻，不动声色却“刻骨铭心”。尤其在当下这样一个经济发展、文化缺失的社会里，知识分子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他们“没法改变社会，只能与社会谋合在一起，但他的内心总保持一方净土，剩下的只是一种清高。这是对过去的传统道德的认定与遵循。”在世俗的力量下，不少知识分子“无法左右自己时，只能选择屈辱”，或“已经被改造成畸形了”，“很多知识分子没有自己的人格”。而方方内心里崇尚大知识分子的风格：高深的学识和强大的人格相结合，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和见解，不为蝇头小利或权势所屈服。正是这份崇尚，让方方在创作中执着的坚守自己的理想，坚持城市知识分子的叙事立场，使作品产生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力量。“她以现实主义作家的遒劲笔力和理想主义激情描绘出知识分子的灵魂和精神，从城市历史的变迁中窥视人物精神的嬗变，

赢得了知识分子的欣赏和共鸣。”

与城市知识分子的创作立场相应地,在题材选择上,有近乎一半的作品是知识分子题材;从表现手法上,她“于市井文字之中融进了韵笔文字”。在创作风格上,不论是知识分子题材还是市民题材的作品,方方也一直用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和批判眼光来审视生活和世事,使作品中往往蕴含着对社会哲理性思考和对现实的深刻批判,渗透着深沉的悲剧意识。

一方面,特定的地域孕育了独特的地域文化,独特的地域文化培养了地域作家,产生了大量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作品;另一方面,“有才华的作家,又可以凭着自己具有创新意味的作品改变地域文化文学的传统面貌。”

可以说,楚风汉韵造就了方方个性张扬、无拘无束的艺术思维,码头文化让她在创作倾向上兼收并蓄、开放包容,市民文化让她形成大俗通雅、平易自然的审美取向,首义文化赋予她敢为人先、改革创新的艺术追求,精英文化则让方方在创作中坚守着城市知识分子的立场。

参考文献:

- [1] 李俊国.在绝望中涅槃——方方论[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
- [2] 樊星.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 [3] 樊星.当代文学新视野讲演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 [4] 陈金川.地缘中国——区域文化精神与国民地域性格[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8.
- [5] 涂文学.文化汉口[M].武汉:武汉出版社,2006.
- [6] 董宏猷.武汉的码头文化[J].图书情报论坛,2007,(01).
- [7] 吕幼安.论武汉作家小说生态中的地域化因素[J].长江文艺,2007,(08).
- [8] 张絮媚.试论方方作品风格及成因[J].大众文艺,2009,(01).
- [9] 樊星.地域文化与作家个性[J].荆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05).
- [10] 陈金泉.新时期现实主义小说的自然化倾向[J].文艺评论,1990,(04).
- [11] 李骞,曾军.世俗时代的人文操守——方方访谈录[J].长江文艺,1998,(1).
- [12] 萧兵.在广阔的背景上探索——兼谈《楚辞》与中华上古四大集群文化及太平洋文化因子的关系[J].文艺研究,1985,(06).
- [13] 方方.我心中的武汉[J].城乡建设,2006,(02).
- [14] 方方.我的城市我的文学[J].图书情报论坛,2007,(03).
- [15] 方方.春天来到昙华林[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81-82,97.
- [16] 方方.阅读武汉[M].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5.
- [17] 殷增涛.“武汉文化”与“文化武汉”[N].光明日报,2004-02-26.
- [18] 佟岩.论方方、池莉小说创作中不同的价值取向[J].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3).
- [19] 王庆生.中国当代文学[M].武汉:华中师大出版社,1999:296.
- [20] 李文杰.城市文化旅游资源开发——以武汉为例[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6.
- [21] 涂文学.关于武汉城市文化个性的几个问题[J].江汉大学学报,2007,(2).

[责任编辑:张磊]

Urban Culture and Its Influence on Native Writer's Writing Style

HE Wang-bo

(Wuhan City Vocational College, Wuhan430064,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argues that writer's personality and temperament, the history and morphology of the city he or she lives, native literary works and the characters are inextricably linked. Thus, it is found that the writing style of Fang fang (a famous writer from Wuhan) has a close association with the native culture of Wuhan city. The magnificent culture of ancient Chu and Han fosters the unrestrained individualistic artistic thoughts. Wharf culture makes her open and eclectic in creation. Civilian culture contributes to Fangfang's easygoing and natural aesthetic orientation. The First Uprising spirits in Xinhai Revolution urges her to be a pioneering and innovative art advocator. Elite culture encourages her to uphold the position of an urban intellectual.

Key words: magnificent culture of ancient Chu and Han; wharf culture; civilian culture; the First Uprising spirits in Xinhai Revolution; elite culture; writing style